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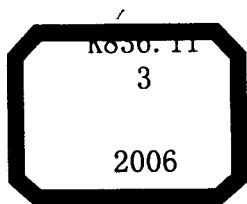
当我们旅行： Lonely Planet 的故事

托尼·惠勒 莫琳·惠勒著

杨 桦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当我们旅行：

Lonely Planet 的故事

托尼·惠勒 莫琳·惠勒著 杨桦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们旅行: Lonely Planet 故事 / (澳) 惠勒 (Wheeler, T.), (澳) 惠勒 (Wheeler, M.) 著; 杨桦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9

ISBN 7-108-02576-0

I. 当... II. ①惠...②惠...③杨... III. 惠勒, T. - 自传 IV. K836.11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8352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 → 2006 - 4943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 数 267 千字 图片 1 印张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序

之所以有 Lonely Planet，是因为当年不停地有人问我们：“你们是怎么从阿富汗到印度的？”“没得病么？”“只搭了个游艇？”等等问题。今天你看到这本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们总是在问我们“两个只剩下两毛七的背包客，你们如何最后能够拥有一个跨国公司呢？”

我们最初的旅程曾经激励了无数想要上路的人们，与此相仿，Lonely Planet 的故事也会在那些梦想把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的事业的人们中产生共鸣。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的访谈并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旅行在你们生活中的地位如何？

你们既是夫妇又是生意伙伴，这种关系是如何维持的？

你们是怎样把照顾孩子和你们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

Lonely Planet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它在不断改变，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从当年二十多岁、怀抱一腔旅行热情的穷背包客，变成了今天五十几岁的百万美元公司的老板，而不变的则依然是对于旅行的热忱。

Lonely Planet 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一直在其中生存并呼吸，我们爱它，尽管这并不总是有趣或者容易的事情，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厌倦。一路上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关于生意，关于如何把生活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关于去承担风险，努力工作；我们也知道了当你敞开胸怀充满好奇地让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时你会遇到什么，所以我们的故事综合了这一切：旅行，工作，人与人的关系。

托尼主要负责来完成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我们决定这本书将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托尼的），但写到关于我的或者我发现的东西，我也将发出自己的声音。

托尼和我仍然在旅行。我们仍然相信激励人们走出去看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我们也依然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广大旅行者对于 Lonely Planet 的信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用过或者滥用过我们书的读者，每一个在路上给我们写信的旅行者，以及每一个在上路之前在包里塞上一本 Lonely Planet 的人，我们衷心地说一句：“谢谢！”

莫琳·惠勒

墨尔本，2005 年 6 月

目 录

1. 穿越亚洲	1
2. 东南亚之旅	34
3. 开始行动，惨淡经营	72
4. 山雨欲来	96
5. 更多的烦恼	128
6. 暂时的宁静	153
7. 转战欧美	182
8. 关于指南书	209
9. 世界上所有的麻烦	245
10. 其他工作	267
11. 不一定总是好人	300
12. 高峰，低谷	316
13. “9·11”及其他	328
14. 路在何方?	343

1

穿越亚洲

“两毛七……”我数着手心里那些可怜的硬币。

几分钟之前，最后一辆便车刚刚带着我们开过悉尼的海港大桥，那时候还未完工的歌剧院正在左边的港口拔地而起。当车子慢慢驶过大桥，坐在后排的莫琳靠着我的肩喃喃地问：“我们还剩多少钱了？”

那是1972年圣诞节后的第一天。莫琳22岁；我26岁。

忙活了半天，我们面对翻遍身上所有口袋找出的那一小堆硬币目瞪口呆。此时，家远在另外半个世界，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我们是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的？

要说事情的起因，我倒是可以精确地说出它是哪年哪月在哪里开始的。那是伦敦市中心摄政公园的一张长椅，1970年10月7日，一个星期三的午后。很多人在生命中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时刻，而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刻。那年我刚刚开始伦敦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当时商学院只成立了五年，而今天它已经是欧洲最著名的 MBA 学府。学校位于伦敦的一个时髦新区，摄政公园边的 Nash Terrace。

10月初，我北上来到伦敦，回到大学。开课刚一周，在那个命中注定的秋日，我去买了件新外套。回来时抄近道穿过摄政公园。对于10月来说，那天的天气是不同寻常的暖和，于是我便停下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刚买的汽车杂志。而此时一个女孩（还用问？当然是个美女！）也看上了我坐的那张洒满阳光的长椅，她坐在了另一端，从包里拿出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

莫琳：我在上个周六下午刚刚抵达伦敦。离开贝尔法斯特时，母亲在机场与我告别。我的计划是去伦敦，找份工作，呆上一两年，然后回家，就像数千个在我之前的爱尔兰女孩曾经做过的一样。伦敦是座大城市，充满了刺激和机遇，体验一下固然很好，但那不是真正的生活。

到我说再见时，妈妈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紧紧地抱住我说：“你不会再回来了。”

说心里话，我希望她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渴望成为那些离开的女孩中的一个。

我住在 Tottenham Court 路旁的一座女子旅舍里，那是个庞大的地方，有着无数的规矩。两个人一间房，有公共浴室和厨房。一扔下行李，我就迫不及待地出去转转。在外边大概逛了几个小时，贪婪地看着，听着，努力辨认着方向。一想到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就格外兴奋。要知道在贝尔法斯特那样的小城里，想要不遇到熟人简直太难了。

在家时，我曾经做过秘书，能够速记或者打字。在预付了两周的租金后，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大约12英镑。不言而喻，我必须先去找份工作。星期天我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仍然沉浸在自由的兴奋中。到了星期一，我就去职业介绍所碰运气。星期二我获得了一份工作——酒业公司 Peter Dominics 的市场经理助理。我很喜欢我的老板，办公室又在摄政公园约克门的一幢美丽房屋中，而工资则是在贝尔法斯特时的两倍。回家的路上我有些晕眩——这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下周一才开始工作，这周的后几天就自由了。戏剧是我的最爱之一，于是我打算去 Drury Lane 剧院看正在上演的 *The Great Waltz*。不巧的是尽管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票居然还是卖完了。好在我还有很多其他爱好，比如音乐和读书。在回来的路上我在书店买了本托尔斯泰的《少年、童年和青年》(*Boyhood, Childhood and Youth*)。那天的天气好得出奇，于是我决定去公园里看书。

我找到了一张阳光灿烂的长椅，可是有人已经坐在那儿了，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个年轻小伙子。来伦敦的短短几天中，已经有好几个小伙子跟我搭讪，所以我有点警惕。然而那是唯一一张在阳光下的椅子，我实在不想放弃。于是选择长椅的另一端坐下，拿出书来。

几分钟后，长椅的那一端开始有动静并传来叹气声。“啊噢，”我心中暗想，“又开始了。”

“啊，请问这里是周三下午伦敦最热门的阅读之地吗？”他说。

我故意慢慢抬起头，打算用最冰冷的反应把他从椅子上赶走，可我的目光却撞上了一双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迷人的绿

眼睛。于是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腔调，微笑着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上个周六我才到伦敦。”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于是梦幻般的一年就此拉开了序幕，不过那天晚上最后发生的事情在以后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我打算走条不同的路线从莱斯特广场回到莫琳住的旅舍，结果迷路了。到今天，我仍然经常这样去尝试并且迷路。

商学院在大楼的一侧为学生提供住宿，第一学年我就住在那儿。莫琳的办公室离我们学校简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箭之地，很快，我们不仅在晚上约会，就连中午都常常碰面。不工作的时间我们大多在床上，只是起来去买份周日报纸（那种报纸沉沉的，加了特殊版还附送杂志），然后把它拖回我们的房间。

1971年夏天，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之间，莫琳和我一起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之前我们也曾经有过很多次英国附近的周末游，可这一次不同，我们带上露营设备，驾驶 Marcos 穿越欧洲。第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自从布拉格之春后令人伤感的地方，接下来经过奥地利到达原南斯拉夫境内克罗地亚沿海的众多岩石海滩和岛屿。然后前往威尼斯，最后途经瑞士和法国回家。

回来以后，莫琳继续在伦敦中心工作，而我则利用余下的夏季时光为一家机械工具制造厂搞了一项调研，那是关于他们的设备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工厂里使用情况的调查。夏天结束后，我们就在 Swiss Cottage 区找了一套位于摄政公园北面的公寓搬到一起。1971年10月7日，在相识整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伦敦商学院的第二年生活像第一年一样飞速而愉快地度过。1972年初，我的第二个大学学期结束了。

我当时拜访了一些公司，找到一份看起来近乎完美的工作：到福特汽车公司在埃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总部做生产计划。当时在欧洲汽车市场，福特的份额远远超过那些最著名的英国制造商。同时，这份工作也将能用上我的工程背景和新学到的商业技能。

但是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吗？莫琳和我真的要安顿下来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吗？我们已经爱上了伦敦的生活，离开这里住在郊区或者是每天长途奔波去上班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吸引力。我们越深入讨论，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什么意思。最后决定暂时把烦恼放下，先环球旅行一年，然后再决定何去何从。我给福特公司写信说我非常高兴接到聘书也很想去工作，但是能否把报到时间推迟一年？他们很通情达理地回信同意了——我今天仍然保存着这封信。

到了6月底，我的MBA生涯开始接近尾声。在学校夏季舞会的那个早上我和莫琳在绿色的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我们是如此的年轻。莫琳简直就像是16岁而不是21岁，而我看起来也比她大不了多少。

在伦敦的最后几个月，亚洲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父亲在航空领域工作了一辈子，所以我也经常被带着飞来飞去，以至于很少会在同一个学校呆上两年。我的青少年时期就大部分是在美国度过的。而且在大学以及克莱斯勒工作期间的每个夏天我都会去旅行。我认为那些欧洲之旅对我而言仅仅是道开胃的小菜，穿越亚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旅行。三年前，在离开克莱斯勒之前，我曾经驾车去过欧洲的边缘土耳其，对我的自制跑车进行了一次小试验。我们想沿着一条与此相似的路线进入亚洲。

克莱斯勒也给我一些灵感。1968 年我刚到公司不久，公司曾经举行了一次拉力赛——这可比赛车更过瘾——从伦敦出发穿越亚洲到悉尼。在这场新龟兔赛跑中，英国分公司参赛的车只是一辆山民猎手 (Hillman Hunter)，但却最终赢得了比赛。当那辆车还在试验部门的车间时，我就曾经注视着堆在车里的地图，想象着到印度和更远的地方去旅行是多么的有趣。

当时并没有很多关于如何长途跋涉到东方的信息，书店的书架也不像现在这样被那些经过认真调查、精心制作的亚洲大陆旅行指南书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本轻便的小书《从陆路到印度》(Overland to India)，作者是一位叫道格拉斯·布朗的加拿大人。

然而更有用的信息来源却是 BIT 指南。BIT (BIT 在早期计算机语言中指资讯量的最小单位) 是 20 世纪 60 年代伦敦的一家公司，它可以帮你从一次烦人的旅程中解脱出来，还可以预约堕胎；可以帮你找住的地方，还可以帮毒贩请律师来辩护。对这些公共活动的财政支持来自各种不同的渠道，其中就包括 BIT 指南。这是由旅行者写的“来自旅途中的信”组成的资讯，是个有真有假多姿多彩的大杂烩。我到 BIT 办公室转了转，付了钱，回家后开始翻阅那些笔记、名字和地址 (几年后，负责 BIT 指南的大胡子专家杰夫·克劳瑟将会对 Lonely Planet 的成长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的计划渐渐开始成形了：首先穿越欧洲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欧洲到达亚洲，向东过土耳其进入伊朗。从德黑兰前往阿富汗，然后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经过新德里继续向上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们知道自己将必须飞过缅甸，由东南亚前往澳大利亚。

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希望能够坚持到澳大利亚，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工作。当时英国公民进入澳大利亚不需要签证，而且可以合法工作。我们盘算着会很快攒够钱回到伦敦，没准回来的路上还可以再到美国玩几个地方。我们将环球旅行一年；而这，注定将会其乐无穷。

我们很快就打消了参加穿越亚洲旅行团的主意，即使我们想参加，也可能根本负担不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很多公司就像城市公交车一样来回穿梭于亚洲。有些小的公司驾驶着陆虎，运营一些奇异而美妙的路线，还有些大家伙如 Penn Overland，它的橙色大巴应该属于比较奢华的那种。另外还有私人运营的拥挤的“魔术汽车”。除此之外还有像 Encounter Overland 这样的公司，它的四驱卡车现在仍然在亚洲大陆和非洲腹地上驰骋着。

前往亚洲的汽车和卡车通常从伦敦出发，开到终点加德满都后再载上新的乘客开回来。这些公司通常由英国的退伍军人经营，他们擅长把旅程搞得像军事远征探险。虽然不能像以前指挥军队一样指挥这些乘客，但是想让这些付费的顾客像新兵一样规规矩矩却是轻而易举。

既然已经决定不加入有组织的旅行团队，公共交通或者自驾车就成为剩下的选择。显然，沿途有时需要依赖公共交通工具，不过我们还是决定驾车完成第一段路程。因为不能在车上花很多钱，所以打算选辆非常便宜的，便宜到必要时可以随时扔在路边而不心痛。

我用过几辆迷你货车，也组装过小型跑车，我们决定找辆旧的但很结实的奥斯汀或莫里斯小型货车。这种车价格便宜，性能相对可靠，而且空间还惊人地大。最后我们花了 65 英镑买到一辆大概有十年车龄的深蓝色旧车。我又收集了一些工具和备件并从专卖废旧零件

的地方买了第二备胎。

随之而来的是个长周末，大学朋友大卫·库珀邀请我们到康沃尔郡大西洋海岸他父母的海滩别墅去玩。周五晚上莫琳工作结束后我们就开着新买的车出发了。那是个典型的交通堵塞的英国长周末，车子的风扇皮带很快就坏掉了。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拿出备件箱里的风扇皮带，打着手电筒设法把皮带换上。可是大约 80 公里后，新换的皮带又坏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个很破旧的第二备件，不过它看起来也是奄奄一息，把它装上后，我们又马上买了个新的皮带。不久我们就不得不换上它。这回导致风扇皮带磨损的原因变得明显起来：发动机轴承正在渐渐失灵。我们好不容易在午夜后到达大卫的海滩别墅，第二天早晨我就给发动机换了个新轴承。

这辆旧车的皮带在接下来与我们相处的时间里再也没有闹过事，但是在周末返回伦敦的路上，这个老爷车又发出了另一种可怕的噪音。这一次是后轮轴承在退休前的呻吟和挣扎。带着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和刺耳的噪音，我们勉强回到伦敦。

几周后学期结束了，我们也整装待发。准备了一些备件、额外的备胎、两个背包、一顶旧帐篷、睡袋、做饭工具和几箱食物，还有书、地图和价值 400 英镑的旅行支票——即使是在 1972 年，这也是一笔很少的钱。我们在伦敦西部伯克郡我父母那里度过了在英国的最后一夜。

“我们将在一年后回来。”7 月 4 日早晨离开时我们宣布。我们开着车在路的尽头拐弯，向印度，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进发。

“欧洲，”我指着轮渡留在身后的航迹。“亚洲”，我继续指着我们正在行驶的方向。

穿过欧亚两洲的分界线，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从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到达这座古老城市的亚洲一端是这次旅途重要的一步。今天有两座桥连接着伊斯坦布尔的欧亚两端，但在1972年的8月，第一座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仍在建造之中。我们把小货车开上轮渡，这是跃上另一个大陆最好的方法，也是奔向东方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几天前我们已经驶入伊斯坦布尔，为了省钱，我们就在城墙外扎下帐篷。令人高兴的是，在那里我们可以与其他旅行者彻夜长谈。这些人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打算去东方旅行，大多数是坐着大众汽车公司的Kombi客车。就算我们还没有开始担心前方的行程，他们所讲的那些关于阿富汗的恐怖故事也足以让我们立即揪起心来。伊斯坦布尔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神秘东方的气息，尽管城市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所有的历史古迹都在欧洲这边，可是它和我们经过的其他那些欧洲城市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位于伊斯坦布尔苏丹阿合麦特区的餐馆 Pudding Shop 是穿越大陆的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过的，只要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一定会看到他们。在今天它仍然提供便宜的餐饮，并在旅行者的旅途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份记忆。

我们从阿姆斯特丹的达姆广场出发，由于对花销控制得太紧，以至于在离瑞士边界还有几公里的时候车就没油了。我搭车到瑞士境内，成功地带回来一加仑非常便宜的瑞士汽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日记里就开始多了好些“没油了”的记载，因为我们总是尽可能地省着花，好让每一分钱都能走得更远。

在巴塞尔时一个前轮轴承坏了，帮助我们更换轴承的英国业余机械师严肃地告诉我们绝对不可能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奇怪的是那是旅途中最后一次轴承失灵，即使是后来我们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反

常的7月暴风雪进入意大利，它都没再出过问题。在意大利我们被偷了，这也是这次旅途中的唯一一次。当时就像广告里一样，美国运通救了我们。后来小偷被捉到了，很遗憾为了上法庭我们又耽搁了一天时间。

轮渡带着我们通过亚德里亚海到达杜布罗夫尼克。接着是雅典，当我们大汗淋漓地从雅典卫城下来，一位笑容满面的女士正在为花园浇水，于是我们便免费享受了一次淋浴。在雅典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上我们喝了大量的葡萄酒，还享用了美味的剩菜。

当我们的老爷车在雅典露营地修整的时候，我们取道爱琴海去了趟莱斯博斯岛体验大海的气息。在渡轮上结交了一位来自南非的年轻人，消瘦的艾弗·肖恩。我们一道坐汽车去了一个美得匪夷所思的小村莫利沃斯。艾弗当时是去看租房子住在那里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其中有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女士名叫芭芭拉·艾特肯，25年后，她成为我们墨尔本公司的员工。

我们和很多年轻旅行者一起躺在沙滩上，谈论着接下去的路程。为了省钱，我们中午不吃午饭，晚上则到考恩开的那个非常红火的小咖啡馆喝便宜的希腊葡萄酒，凌晨才步履蹒跚地回宿营地，而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对自命为“天空和蓝色”的美国嬉皮士在海滩上做清晨瑜伽，他们的背后就是海峡对面的土耳其。

夜里考恩总是醉成一摊烂泥，于是他根本就不可能清楚地计算顾客的账单，所以每次我们爬出睡袋，在水龙头下洗漱完毕后就会溜达到他的咖啡馆去结清账。

回到雅典，我们继续开车向萨洛尼卡前进。旅行总是可以创造出一些有趣的机会让人们邂逅，而这邂逅继而会导致其他的相遇。有时可能是几年以后。这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在海滨小城普拉塔蒙外的

露营地和一个澳大利亚年轻人西蒙·波特共度了愉快的一个晚上，当时他正在自己的欧洲大旅行途中。几年后，全世界的 Lonely Planet 指南书都会在他墨尔本公寓的沙发下暂时存放。再后来，我成为他的伴郎。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拿到了伊朗签证，但是必须在安卡拉停留，申请去阿富汗的签证。离开安卡拉后，我们向南到卡帕多细亚地区的葛勒梅，那里有奇异的利用岩石挖成的房子、教堂和其他建筑。然后北上到赫梯古城博阿兹卡莱和哈图萨，黑海港口城市萨姆松和特拉布宗。之后又向南到了埃尔祖鲁姆，在阿勒山山影下的多乌巴亚泽特的露营地熬过了冰冷的一夜，最后越过边界进入伊朗境内。

莫琳：我热爱土耳其：它是我第一次的“东方”体验，而这种体验彻底地迷住了我。当我第一次看到路旁吃草的骆驼时，我确实是惊呆了。我们经过的村庄就像是电影《万世流芳》（*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中的布景，驴子绕着巨大的磨坊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磨着稻谷。遇到的女人都遮着面，她们张大的眼睛显得非常惊讶。当时的我年轻无知，无法理解她们为什么这样看我，但是却总是被眼前那种瞬间的友好和自然流露出的慷慨所打动。

当人们问起我们的第一次旅行，最常见的问题是：“你们最糟糕的时刻是什么？”他们好像真的期待听到一次可怕的袭击或者是一些类似的恐怖事件。我的回答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的确，我们曾弄丢过东西、失过窃、曾在不顾一切飞奔的汽车上惊恐过，有时也曾经遇到过一些让我们反感的家伙，但是总的来